

后工业的可能性

——经济学话语批判

〔美〕弗雷德·布洛克 著



商务印书馆

后工业的可能性

——经济学话语批判

〔美〕弗雷德·布洛克 著

王翼龙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工业的可能性:经济学话语批判/[美]布洛克著;
王翼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148-2

I. ①后… II. ①布…②王… III. ①后工业社会
(经济学)—研究 IV. ①F0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67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后工业的可能性

——经济学话语批判

[美]弗雷德·布洛克 著

王翼龙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148 - 2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8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后工业的来龙去脉	3
第二章 经济社会学	25
第三章 市场	52
第四章 劳动	82
第五章 资本	132
第六章 产出	170
第七章 换种思路:质量优先的增长	207
索引	239

前 言

ix

本书篇幅虽小,但有三大目标。首先是换种方式,对后工业理论作一番陈述,而且赋予它新的活力。其次,是以实例说明作为了解当代经济的一种方法,经济社会学所具有的影响力。第三,则是为反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选择,提供一种可资选择的参照标准。显然,独此一书,这几项任务中,完成哪一项都使人有力不从心之感。更何况,书中谈及的各种论题,意义又都如此重大,独立存在的各章,都只不过触及与我的论点有关的数据资料和学术成就的表面而已,应该纳入这项分析的新的论著,又差不多每天都在出版发行中。然而,要是能够起到鼓励别人更为持续、系统地开始研究这些问题的作用的话,我认为我还是有理由发表一篇短论,确切说,是一项尝试的结果——诚然,是带有暂时性的,尚待完善的。要是没有人执著、理智地作出这样一种大胆尝试的话,那就确有危险了,这就是,严肃的学术成就仅限于适合于某一个学者精深研究的面窄的问题,当代重大问题,则无人通晓了。

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蒙恩感激不尽。美国杰曼·马歇尔基金会 1986—1987 学年给了我资助;那一年如果无法潜心研究和写作,本书可能就脱稿不了。我还对宾夕法尼亚大学评价和振兴社会科学计划表示感谢,该计划连续几个夏季向我提供研究资助。更重要的是,本书的论点,是反映我在该计划举办的研讨会上从我

的同行那里所学到的东西的。

x 有很多人提供了关键的参考书或资料,其中包括保罗·阿德勒,安·米勒,珀特里夏·鲁斯,和迈克尔·温斯坦。很多人读过各章或全部手稿,并提了宝贵意见,这包括丹尼尔·贝尔,南希·福尔布雷,罗杰·弗里德兰,杰里·雅各布斯,亨里卡·库克利克,弗朗西丝·福克斯·皮文,塞谬尔·普雷斯顿,卡门·西里安尼,朱迪·斯泰西,安·斯威德勒和罗伯特·伍德。原稿还因彼得·德雷尔和内奥米·施奈德的编辑工作而大为增色。过去 15 年间,有五位朋友对我的想法的逐步深化始终是尤其重要的,他们是拉里·赫希霍恩,卡尔·克拉雷,马加利·萨尔法蒂·拉森,达维德·普洛特克和佩吉·萨默斯。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无以言表。

我受我全家的恩惠也数不胜数。我深深感谢我的母亲让·利布曼·布洛克和我的父亲弗雷德里科·H. 布洛克,感谢他们对我的爱和支持。我不愿用动听的话对我妻子卡罗勒·约菲表示谢意,虽说那或许是需要。她的爱和智慧使拙作大为生色,说这一句话就够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米丽娅姆·布洛克和朱迪思·约菲·布洛克,一如既往,由衷地希望她们将享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一奉献,谅必实难酬谢她们给予我的一切。

第一章 后工业的来龙去脉

1

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时期，因为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种社会，还缺乏某种共识。祖祖辈辈都以为美国是工业社会，但对现实的这一释义，不再令人信服了。有说服力的、可供选择的，又尚未出现。

这种混乱和含糊不清的情况，在注重实际的观点和社会理论中都有反映。有关我们所处的这一历史时代的性质，当代社会理论家绝少谈及。^① 社会理论家都专注于超理论的问题；很多理论上的争论，都集中在界定社会理论的固有范围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决定应创建何种理论上。在解释当代社会的性质和描述它们的主要动态方面，近年来所下的工夫相对很少。下这种工夫，现在似乎差不多也就看作是守旧的一套，再现 19 世纪理论家的远大抱负是落伍过时了。^②

① 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直接告诉我们的，极少；他们在界定社会性质这个经典问题上保持沉默，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于此普遍沉默，有例外，但对旨在反映社会理论争论现状的新近一卷中的论文（安东尼·吉登斯和乔纳森·特尔纳编辑，《当今的社会理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 年]）就强烈支持这一结论。也有不完全支持的，其中重要的，有罗伯托·曼加贝拉·温赫尔新近的多卷本著作，《政治：建设性的社会理论著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和安东尼·吉登自己的多卷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81 年，1987 年）。第 2 卷，题为《民族国家与暴力》。

② 事实上，这是受过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很多人的见解。在他们看来，创建一种统

当代理论家的这种沉默,含义深远,它说明,人们对他们所处的那类社会还缺乏某种理解,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现代社会,社会理论在向我们提供了解我们的社会环境的路线图上,发挥着某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在高深社会理论与普通“常识”之间,尽管有着复杂的种种中介物,但两者还是以多种重要方式联结在一起的。^①

在社会理论未能解释我们的社会的性质的那几个时期,往往就会有其他的想法填补民众理解力上的空白。正如凯恩斯谈及经济学时所说的,声称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人,通常都被人们早已遗忘了的某个蹩脚作家的思想所征服。在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期,填补了当代社会理论的这种沉默所留下的空白的,是经济思想,尤其是凯恩斯学派前的经济思想,这具有讽刺意味。20世纪80年代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引人注目的复兴,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满足人们对指导其日常行为的某种社会共识的需要。^②

社会理论的相对沉默,根源在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继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削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此前,它们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和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都鼓吹一种逐步发展的必胜主义;这种思想,视美国社会已经

一的社会理论的任何尝试,都是按理性而言站不住脚,又有强人所难的潜在可能性。

① 在形成有关现实的流行观念上,社会理论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看法的经典来源,是葛兰西。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监狱笔记本文选》第1卷(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71年)。

② 原教旨主义宗教思想填补了很多人的这一空白。当然,在自由市场思想与福音书的基督教教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见卡尔·波拉尼,《大变革》(1944年;重印,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7年),第249—258页。

逐步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了解决诸如阶级冲突、经济危机和剥削一类工业主义的历史问题的方法。这三类方法,都宣布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文明的国家行为 3 和协商一致的精神,会使得剩余的种种社会问题有望逐步解决。这三种方法,就其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说,都直言是自由主义的。

对美国社会所持的这些乐观主义看法,一一为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政治、社会各项发展所驳倒了。遵循这些传统工作的理论家,对这些新的发展提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结果也就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他们的观点都丧失了权威性。**经济自由主义**,现已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意谓嘲笑对象的用词这一事实,就是对那些观念陷入危机的最具戏剧性的证明,这些观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曾经支配了社会科学的话语。

就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70 年代初期的一个短暂时期说,这些主流观点的左翼批评家,好像是能够另建某种社会理论的,这种理论,或许终能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首先,根本问题上的深刻歧见,在激进派学者对主流见解的抨击似乎要胜利时,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其次,很多左翼人士证明都不愿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而这种阐述,早就是落后于历史发展的了。左翼人士还超越不了对现行制度安排的一种批评;左翼未能就美国制度能够和应该如何加以改造提供一种可供采用的设想。

主流派社会理论和左翼社会理论两者的危机,都为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复兴开辟了道路,这一传统,大萧条以来基本上一直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骚乱,人们作出的回答几乎仿佛就是说:“我们也许不再知道这到底是何种社

会,但我们的确知道这是一种市场经济,而使一种市场经济运转的最好方法,就是实施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公开争论,是越来越取决于经济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取决于我们现在处于何种社会,或者希望处于何种社会。因此,一系列的社会政策,现在几乎都完全依据它们与市场的规律有多适应展开争论了。

- 4 如此以某种经济理论充当更全面理解社会的一种角色,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首先就表明,我们的政治见解,受“虚假必然性”一说,亦即,市场现实彻底制约我们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选择的论点,所左右了。^① 例如,我们一再听说,我们出于对穷人的同情而制定和实施福利计划这种努力,必然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采用不正当手段左右劳动力市场运转,势将产生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② 在过去几百年的思想史上,这种论点的“自由市场”前提一再受到质疑这一事实,没有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自由市场”思想的彻底失败,现在几乎完全给忘记了。这证明,一旦社会理论丧失理解人们的经验的能力,即使以前被推翻了的理论,也会被复兴并被人们利用。

后工业理论,有可能提供某种有说服力的当代社会地图,以填补理解上的这一差距。然而,迄今为止,这尚未发生。即使在社会理论家中,后工业思想也还是处于当代争论的边缘,其于更广泛的公开辩论的影响一直有限。若能把握且克服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

① 虚假的必然性,是罗伯托·曼加贝拉·温赫尔的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尤其参看《虚假的必然性:激进民主制度贡献中的反必然论的社会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详见弗雷德·布洛克,“对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反思”该文收于弗雷德·布洛克,理查德·A.克洛沃德,芭芭拉·埃伦赖希和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所著,《麻烦的季节:对福利国家的抨击》(纽约:伟人祠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第109—160页。

的话,后工业理论,是能够阐明我们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的。^①

后工业主义理论

5

丹尼尔·贝尔,先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多篇论文中,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后又在1973年出版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详尽阐述了这个概念。^② 同期,另外的一批学者,也对一种类似的历史不连续这一思想——有时称为“信息社会”,“服务社会”,或“以电子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社会”^③——进行了探讨。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的后工业论点的通俗化版本《第三次浪潮》,是一大畅销书。^④ 然而,托夫勒写的书,似乎并没有使讨论热烈起来,倒是成了讨论归于偃旗息鼓的一个标志。20世纪80年代,围绕后工业社会一说的长篇大论相对少了,^⑤ 贝尔和阿尔·图

① 在写本书时,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开始大为流行。虽然该概念源于艺术分析,但后经引申,是用以表征一切社会生活了,现在,更是在直接与后工业主义这个概念一争高下。后现代性这个概念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它明确承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各种最重要概念,有鉴于现代性的超叙述性,已不再能理解人们的经验了。参看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知识报告》(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后现代理论家中,有的,对填补这一空白是否可行或可取,持怀疑态度,但另外的,则显然是认为需要一种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用以描述建立这样一种理论的这一知识工程,是选择后现代这个术语,还是选择后工业这个术语,是有随意性的。

② 引文出处,见平装本版(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76年)。

③ 参看贝尔著作的引文出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51—55页。另见阿尔·图雷纳,《后工业社会》(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格雷格·卡尔弗特和卡罗尔·尼曼,《中断的历史:新左派和新资本主义》(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

④ 纽约:威廉·莫罗,1980年。

⑤ 属于这些重要例外的;首推拉里·赫希霍恩的论著。尤其参看,《机械化之后:后工业时代的工作和技术》(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工作场所范围内:组织寿命的心理动力因素》(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雷纳等人转谈其他问题去了。此外,80年代更是有了断然拒绝这个后工业观点的迹象。1987年斯蒂芬·S.科恩和约翰·齐斯曼撰著的一书就用了《后工业经济之神话》这个副标题,而该书,其时是备受关注的。^①

即使如此,作为一个术语,后工业这个词实际上还是广为使用的,尽管社会理论家和受过教育的公众,都没有认真接受这个思想。该词,通常是作为现代状态的一个相对空洞的同义词用的;“后工业的美国”,是新闻记者或学者说“当代美国”的生动一些的一个措辞。但这个措辞的这些用法,并没有包含为理解当代社会具体特点而认真作出的任何努力在内。

即使该理论已被边缘化了,可该词还是有人广为盗用,这有一个原因。该词是以人类发展三大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个思想为依据提出的。不过,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性尚未得到明确的描述;现在也就是说它是工业社会之后到来的阶段。后工业这个词只是一种标识,暂且代替在历史过程的稍后时候或许会出现的具有更多实质内容的标签。正像工业社会这个用语,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得以广泛使用一样,人类历史的这个新阶段的特性,也许也得再过若干年才会得到恰当的描述。^②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助于说明,很多社会理论家何以漠视后工业主义。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承载着19世纪进化论思

① 科恩和齐斯曼,《制造业关系重大:后工业经济的神话》(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② 拟取而代之的更具实质性的术语——服务社会、信息时代、控制论时代等等——有很多,但其中,没有一个反映得了隐含于后工业主义的转变的宽度。

想的很多包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个类型学,颇似 19 世纪的很多进化论模式,这些模式,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个阶段,以说明各阶段如何导致下一阶段。孔德,或马克思,或斯宾塞,用以表征特定人类发展阶段的那些术语,不止是简单的标签而已;正相反,它们是设计出来,用以概括该人类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的。此外,进化的推动力,即强行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压力,与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都有紧密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产生资本主义自己的掘墓人,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本质的组成部分。

当代社会理论中,有很多,都是对这些 19 世纪思想传统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尽管通常认为,这些进化模式,继续在常常是无意识地形成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可这些模式,就因为它们的本质主义、它们的乐观主义,和它们的决定论,而受到全面批判了。^① 这些理论,往往把一种复杂的社会现实,就归纳为一种本质,但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做法。人们如何决定何者是本质的,何者是副现象的? 或者换种说法,当代社会科学家,对处理各种智力概念与这些概念据认为应该包含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困惑的关系,要自觉一些。例如,“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就是一个有用的抽象名称,它使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社会的共性突出了,但谁也不会指望,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一经冠以“工业”一词,就能为理解属于这一类的所有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最重要线索。19 世纪思想的那种乐观主义,早就由于 20 世纪所经历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全面战争和残酷的中央集权制政权而荡然无存。此外,当代很多学术成就,对

① 这一批评,是温赫尔在《政治》中阐述的基本主题之一。

隐含于这些进化模式的决定论，都是持尖锐批判立场的。社会安排基本上由经济或文化动力决定这种看法，受到了一大批著作的质疑，它们是强调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种种历史偶然性的。

总之，问题在于，后工业理论与社会理论当前的重心所在看来是不一致的。人们曾经认为，它是具有决定论的、进化论的和本质先于存在论的特征的，而其时，这些是都被视为严重的谬见的。有的后工业理论家，尤其是丹尼尔·贝尔，曾试图避免引起这些联想；他直言不讳，指出他提出后工业主义这个概念，原本并无要使人们注意先进社会的内在动力的意思，而是想使之成为可据以计量未来发展的一种“纯理论概念”。此外，贝尔还以其自己提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都据其自己的独立的“轴向原则”发生影响，而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的论点，对社会理论中当前的反决定论重要性作出了贡献。^① 不过，贝尔的后工业主义论著还是常被误解，其他的理论家，又直接陷入了按照某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过程阐述后工业理论的困境。^② 因此，后工业理论，终至被看成与进化论和决定论假设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可见，后工业理论要实现某种复兴，就必须做两件事。首先，该理论必须以使之与决定论的和进化论的读物断然区分开来的某种方式，再次予以系统阐述。其次，该理论必须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它必须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以及我们和社会所

① 这一看法，是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提出的，它实际上是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本 1000 页的手稿中获取而来的。

② 这一批评，也适用于弗雷德·布洛克和拉里·赫希霍恩“新生产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收入弗雷德·布洛克，《修正国家理论：政治和后工业主义论文集》（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99—126 页。

面临的种种选择。在一个层次上,这些都是相互矛盾的目标。某种理论考虑偶然性的余地愈大,它对行动的指南作用就愈弱。然而,在另一层次,这些似是相互矛盾的目标,又是可以实现的。

再论后工业理论 I

进行这种再次系统阐述时,第一步是要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科学的各种概念,不仅仅是分析用的抽象概念,而且,在从社会生活某种潜在混乱中创造一定的秩序时,它们本身还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工具。有了这一深刻见解,就可以把后工业主义重新解释为工业社会理论失去价值的结果。

诸如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等总概念,都是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惯例的发展方向的重要的行动指南。例如,19 世纪建立教育制度时所遵循的那种具体方法,就与有关当时属于何种社会的明确或含蓄的想法大有关系。做到了使自己提出的建议与社会前进方向这一点上公认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教育改革者,与自己的改革建议同社会科学的总概念相脱节者相比,前者常就出色一些。^①

这些总概念,在形成有关各种不同社会制度间“相适应”的相对程度的看法上,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有一个不间断的制度选择过程,人们通过这个过程,根据某些特定原则,改变和改革社会制度;这就是最广义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不同的

^① 这些看法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是这样—个概念,即这是一个市场社会,而另外的社会制度,应该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这种看法在第三章予以批判。

- 9 利益集团,都竞相影响结果。但这些相互竞争的集团的力量均势本身,又是受在此类社会是合情合理的思想的影响的,而且正是在这里,社会理论以帮助形成人们思考特定制度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不论特定社会过去斗争中有过何种遗产,社会理论都能形成有关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惯例之间“相适应”的观念。既然评价各种制度之间功能关系的程度的“客观”标准有着内在的问题,因此,社会理论也就有把现实说成是一种相适应的现实或者不相适应的现实的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和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工业社会”这个总概念,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社会,在解释社会性现实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正如理查德·巴德姆所写,“在学术话语的有限范围以外,工业社会的标准形象,在确立当代社会同一性和政治纲领中,都起了重要作用。”^①以制造业的效率和规模不断提高为基础组织一种社会,这一想象,对形成社会斗争和社会改革,起了某种样板的作用。例如,在进步党时代,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在改变美国制度的努力中,就起到了指导原则的作用。类似地,实施新政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的各项改革,都是继续以工厂工人居于中心地位这一假设为依据提出并实施的。诚然,是总有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不相协调的社会性现实的若干重要方面——例如,非洲裔美国人在南部农业中的作用——但工业社会这一概念,还是足以粉饰美国制度的一致性。^②

① 理查德·J. 巴德姆,《工业社会理论》(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② 这里提出的这个论点,酷似斯科特·拉希和约翰·厄里的论点,后者见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终结》(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7年),分析多个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时,他们区别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更协调的时期和“陷于混乱的资本主义”时那个不相协调的时期。

但社会科学各种概念解释现实的能力,不是无限的;社会的变化,可以引起日益引人瞩目,且可使有关现实的公认定义的说服力 10 化为乌有的种种“理论异常”。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难以解释为,或理解为工业社会组成部分的三大社会趋势。每一大趋势,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只是到了 60 年代晚期,它们这才开始构成异常。此外,这些趋势,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还在继续加速显现。

这几个“后工业”趋势中的第一个,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及商品生产,即制造业、农业和矿业,在就业总量中的重要性不断减小。虽然服务类高度异质,包括极其多种多样的活动类别,问题依旧还是,工厂所在地已不再是就业的主要集中地了。但重要的,还不只是统计事实;60 年代最剧烈的社会冲突往往出现于大学、福利机构和医院等服务机构这一点,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第二个趋势,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动化的到来。20 世纪 60 年代它蹒跚来迟,其后则是迅速扩展了。正如拉里·赫希霍恩等认为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动化,往往既改变蓝领和白领分类下工作的组织,又改变蓝领和白领分类下工作的经验。^① 尤其是,特有的工作组织“工业”模式,就是给工人严格规定稍加留心即可完成的刻板的重复工作的那种模式,基本上瓦解了。计算机化对工人的技术水平究竟产生何种影响,还在激烈争论中,但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新型工作,工人其实要比以往更加全神贯注,才能胜任得了(第四章还要详述这个问题)。

① 赫希霍恩,《机械化之后》,第 113—169 页。